

人物档案

# 绿色里的身影

——怀念我的父亲解礼尚

解剑冲

在那个阴影笼罩、疫情甚紧的春天，我们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一天是2023年2月18日。我想，走过辛勤奔忙、一生守护绿色的父亲，他是真的累了。

父亲走时，山里的绿树刚伸出新芽，湖边的杨柳垂着枝头似乎在诉说着大山里“绿色身影”的故事。父亲的很多同事、朋友纷纷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哀悼和怀念，让我感动，也让我对父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父亲早年在观城钢铁厂做过炉工，在下窑窑厂干过窑工。上世纪60年代回乡务农，从山林队的护林员做起，担任过生产小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等。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怀着心中的那一抹“绿”，爬遍了五磊、双峰的山山弯弯，踏遍了大岙、小岙的溪溪坑坑，带领社员们筑山塘、垒堰坝、挖水库；开垦瘠地造田、荒山育林，扩种杨梅、茶叶、毛竹等经济林。在造“走资派”的反的那个年代，父亲一度“靠边站”，远离村庄，去前房岙、庵弯岗的深山里守护这片山林孤岛。就是这个经历，使他成为社员们口中的山林“活地图”和林技“土专家”。

1974年，父亲被抽调到明湖公社从事林业专管工作。在之后的20多年间，他一直在宓家埭和鸣鹤镇工作，专注他的“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梦想。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他的办公室里总有一大叠蓝色的林区分布图和一堆摆得整整齐齐的护林笔记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图表数据，例如什么季节、什么山头容易发生山林火灾，什么林区应开辟防火道，什么针叶林、阔叶混交林会生病虫害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父亲担任乡（镇）农技站、林特站负责人时，经常能脱稿说出大量统计数字；抓一把泥土捻一捻，就可说出土壤的种类和性能；指向一种树木，就能随口讲出其生物学特征和栽培管理办法。镇里的领导和林业部门的专家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清晰的工作思路印象深刻。我想，父亲身上的这些特点，和他林业技师背景不无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种植地段）后，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父亲认为林地承包到户后，应掀起荒山造林行动。为此，父亲在镇领导的支持下，在杜岙村租用了一块荒山，进行育苗造林试验。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地说：“这块荒山是生地，石块多，怎么能育苗成林呢？”现在的人可能没法理解那时基层干部的朴素想法。几年后，昔日杂草丛生、乱石遍地的荒山秃岭，形成了一道绿色屏障，变得郁郁葱葱。父亲的荒山育苗造林试验成功，引得广大山区农民纷纷效仿，一些闲置的荒山陡坡、深沟沟壑都披上了新绿，父亲也因此被评为县先进生产工作者和绿化先进单位个人。

父亲不仅投入到改造荒山、植树造林的事业中，还想方设法推动山区林特经济。1987年春，他将几株野生雷竹移到东山的荒坡上，进行“雷竹笋速生试验”。第二年，坡地上冒出200多株金灿灿的小雷竹笋，宓家埭乡领导和老区经济开发办的专家实地考察了雷竹笋速生试验情况，认为种植雷竹笋有“钱途”，能带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就让父亲和他的林技员们进行“雷竹笋密植速生高产试验”“丰产素雷竹高产试验”。1989年，黄牛岭上一块小小的雷竹园，形成一大片竹林，当年的雷竹笋收入达到6000余元。同年，速生高产和小阳春出笋试验通过省、市林科部门鉴定，《宁波日报》《浙江科技报》《农村经济信息报》相继报道了“解礼尚小阳春雷竹笋高产试验成功”的消息。

在探索雷竹笋高产栽培技术、配方施肥技术和保鲜技术的10余年间，父亲摸索出一套雷竹笋“一年种、二年养、三年见效益、四年达高产”的管理方法，成为远近闻名的“雷竹大王”。随着雷竹笋种植经验的不断积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积极举办雷竹笋栽培管理技术培训班，开展雷竹笋病虫防治科普讲座，为竹农印发技术资料，组织他们到试验基地参观，并免费提供种苗。省林科所和市农经委的一些专家、领导非常赞同这种“农家讲堂”，特地送来一批竹、笋培育技术手册和图书。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鸣鹤、宓家埭、东埠头一带的荒山、低岭、深岙和村前屋后广种雷竹，使雷竹笋特色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其中“鸣鹤雷竹”“杜岙雷竹”被评为市优质农产品，成为慈溪文化集萃《慈溪百品》上的林产品之一。父亲以带动山区农民在家创业致富的林技工作者身份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父亲在家中话不多，在子女教育上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但那句“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做出一点成绩来”的话却常讲。事实上，他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当我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一点成绩，也被评为市劳动模范时，父亲只说了一句：“父子都是劳模，好啊！”那一天他笑得很灿烂。

退休后，不忘初心的父亲没有放慢植绿、护绿的脚步，仍坚持每天爬山头，把各个山岙、林区的地形、走向、岙底沟谷和重点防火区域分类记录，供接班的人参考。有一段时间，他跟着梅农们学杨梅树嫁接，研究“杨梅树霉根防治”“杨梅树白蚁灭杀技术”等课题，其中“竹笋两用林白蚁防治技术”“雷竹笋速生高产技术”等成果还获得宁波市科技进步奖和绿色丰收奖。父亲还在雷竹园混种鸡竹，竹林下套种蔬菜。也许，在父亲内心深处，他永远是山林里那个忙碌的“绿色守护人”。

2016年9月，父亲因突发脑梗住院，在跟病魔抗争的岁月里，仍不忘他心中的那一片“绿”，杨梅树矮化锯了么？竹林可以施肥了……我想，包括父亲在内，他们那一代人，已经把心血洒在这片土地上，把生命融进这个时代里。思亲腊尽情无尽，念父春归人未归；想父音容空有泪，欲闻教训杳无声。父亲，在茫茫大山绿色里的身影，就像一片叶子，当果实成熟的时候，静静飘落。

我想说：父亲如有来世，我还愿意做您的好儿子。

海地旧事

# 大塘河的开掘

郑陆

大塘河，绵延百里，至今已流淌四百六十多年，我们尊称它为“母亲河”。

道光《浒山志》引当时人言：“尚书沈庄敏（沈应文）曰：浒山而东，各于田下浚新河益深，畜陂泽……浒山而西，旱则可互灌，潦则可泄水。若木棉、豆、麦，其利倍于嘉谷，而水泉似可少缓。因地制宜，规划已尽，非复曩时比矣！”

又：“岑原道曰：自梅川以东，其间四、五里内，并可为田，患在水泉寡不救。然今塘（指大塘——引者注）南田，遇旱，即夜穴（掘洞）塘，引海沟水灌之。诚令缺（决，开挖）古塘，张陡亹（深沟），南北通水互灌，可以兼利，是塘北亦有水泉也。……并取诸海地修御潮塘，令高完。于浦口多张水门，春雨水溢，决使入海，秋冬筑之，以障潮汐。如此则塘北之地渐为沃壤，亩可万计。亩收一钟，则北乡民食，可望足矣！”这是大塘河给后世带来灌溉、排涝的水利。

大塘河，原作为抗倭的军事防备工事，于1555年开掘，当时叫“新河”。

“新河，在古塘下。嘉靖三十四年，倭舟泊海涯，北乡之民首受杀掠之祸。邑令李伯生请于古塘下穿河一道以备倭，东自观海，西连临山，相距百余里，阔二丈，深一丈许，路口置立栅门，乡兵巡逻守禦……既足以备一旦之急，而平时亦有溉田决水转输之利。”（《肇域志·浙江》）。出于军事目的的大塘河，在和平时期，发挥了水利灌溉运输等效用。

当时，大古塘南东西流向的河流，大的只有东横河。余姚县东北二十五里，引烛溪湖之水，合县境东北诸溪河，北至观海卫，西过石堰，南注姚江。又一条是西横河，在姚北西三十里，引牟山湖之水，西经上虞县，北至临山卫，至海塘（《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大古塘北的滩涂和草荡都是用来刮卤煎盐的，自然形成又经改造有多条灶与灶之间的“灶江”，煎盐的灶甲与灶甲之间的小河沟。灶江和甲与甲之间的沟洫大都是南北向的通海口。大塘河开挖后，把南北纵向的灶江横贯连通了起来。后来筑的海塘大都平行有一条塘河，形成了纵横连通的网格化水系。

地域文化探源

# 徐福的“不归路”

喻军

古时以北为阴，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诗·公刘》云：“即景乃冈，相其阴阳。”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即按坐北朝南的方向修建村落房屋，以顺应天道，得山川之气，受日月之光。历代皇陵也都以“坐北朝南”为方向，惟秦始皇陵“坐西向东”，何故？说是

为了盼望东渡未归的徐福。当年秦始皇帝方士徐福携“百事之工”、资以五谷种种及数千名童男童女浮海东渡，据说是为去海上三神山求长生不老之药，然徐福一去不返，从此成为千古之谜。这里便有几个问题：其一，秦始皇真是出于这个动机吗？我的看法是：难说！且看他首次巡海所立的碑文：“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这是迷信神鬼的口吻吗？他自称“始皇”，大修墓地，即可看出他也知命，并不真信长生不老之事。那为何劳师动众外派徐福呢？我想多半出于养生、长寿的考虑吧。以为世上真有这么一种延年益寿的仙

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出于“以示强威，服海内”的壮志雄心使然，令徐福寻药的同时，彰显一下恩泽四海的气度。其二，徐福为何一去不返？这有很多种猜测和分析，我认为避祸不归恐为合理推断。公元212年，咸阳城内有400余名儒生、方士被杀，史称“坑儒”。虽有政治原因，却也与方士们长期寻药无果、秦始皇觉得受了愚弄，遂以“妖言以乱黔首”之罪杀人泄恨有关。徐福也受到警告，“徐市（即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措辞不可谓不严厉，胆小的自然不寒而栗，事实上有不少方士如卢生等早被吓得开溜了。徐福是个聪明人，虽苟全性命于一时，然心理上却不可能没有盘算。他很沉得住气，直到两年后才编了一套说辞，蒙住了秦始皇，这才靡费周章，供其出海，酿成史上最华丽的金蝉脱壳之计。

那么，带着3000童男童女及“百事之工”出海未归的徐福，究竟去了哪里？是否如传说中的去了日本？至今尚无定论。但对于徐福的记载和研究，自西汉迄今已2000多年，究其源头，当属太史

公的《史记》。在《史记》的《纪》《传》《书》中，太史公反复提到徐福率众东渡的时间、地点、人员、物储、困难、往返等，最重要的一句话即“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很多学者认为“语焉不详”“扑朔恍惚”，没有交代清楚是否去了日本。能苛求太史公吗？西汉尚无“日本”这个国名，你让他如何标注“平原广泽”就是日本呢？除《史记》外，这方面较有分量的记载还包括南朝晔的《后汉书》、晋代陈寿的《三国志》、五代后周义楚的《义楚六帖》和北宋欧阳修的《日本刀歌》等，与《史记》的记载大同小异，糅合了一些神话和文学色彩，未免有近诞离奇之嫌。但无论是陈寿提到的“夷洲亶洲”、范晔提到的“东夷”，还是僧人文楚提到的“倭国”和欧阳修提到的“传闻其国居大岛”等，都令后人更倾向于“徐福是去了日本”这一观点。到了清代，随着负笈东瀛的学者渐多，比如黄遵宪、薛福成等人皆持徐福去了日本这一立场。

历代有些日本学者包括当代若干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徐福乃日本武天皇，即日本的“始皇”。有

人经考证发现，在日本的开国神话特别是关于神武天皇东征的记载中，竟有37处与徐福的经历侔同。有学者宣称在日本经过实地探访，找到徐福遗迹共56处，还考证出神武天皇的父亲和徐福父亲同名；其祖父与徐福故乡琅琊郡（现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所祀四时主神相符等。他们据此认为，正是徐福庞大的船队所载负的丰富物资及登岸后的文化传播，才改变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日本，与原住民共同奠定了最初的文明形态。日本曾有个华裔首相叫羽田政，自称徐福的后代。他经常参拜徐福祠堂，任内积极促进中日间的来往。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这是明治维新前日本汉学家在“崇华”理念支配下的产物，不足为信。还有学者指出，以徐福如此体量的船队，在当时的航行条件下根本到不了日本。

总之，历代对于徐福归宿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做到一锤定音。或许，这就是历史和考古的魅力，使得中日交往史的溯源工作必然赓续相传，值得反复探究。由于年代久远，毫不讳言，有些史实，恐终成永难破解的历史之谜。

# 寻找进士翁焘

任永江

中国古代以科举取士，考中了举人、进士，那就算是打开了仕途之门，可以入朝做官，光宗耀祖。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从隋唐开始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次进士考试，前后经历了1300多年，产生了12万名进士。

2015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慈溪地方志专家王孙荣所著的《慈溪进士录》，其中收录慈溪市境和慈溪县境文进士504人，武进士44人，一共548人，而这个数字，在全国县市中，已属于比较高的了。读书人要想成为进士，必须通过三年二次的县、府、州的童试，成为生员（俗称秀才），取得参加科举资格。再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与殿试，才能金榜题名成为天子门生。这其中只要一个环节进展不利，就会在科举路上蹉跎好几年。有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秀才的录取率在10%左右；乡试的录取率更低，平均录取率只有3.1%左右；会试的录取率相对要高一些，约为24%；殿试通常只排定名次，评出状元、榜眼和探花。清代开科112次，录取人数26849人，平均下来，三年一次录取240人。这些进士，大部分都集中在发达省份的某一个府或几个府，绝大多数的州县，几十年都出不了一个进士。

翻检《清代珠卷集成》《浙江省人物志》《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都无翁焘信息。又查宁波数字图书馆，有一段词条：翁焘，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人，清朝政治人物、同进士出身。光绪十六年（1890年），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登进士三甲38名。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网上零零散散搜到一些资料，《崇文书院课艺十集》中介绍：“翁焘，字又鲁，号亦衡，慈溪人，钱塘籍。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十六年（1890年）进士。官绍兴府教授。”于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上下二册，其中《崇文书院课艺十集》上记载，“光绪甲午（1894年）十月开雕”“掌教翁又鲁先生鉴定，监院许承绶、姚巳元编校”。除翁焘的简介外，还有他写的一段序：

“【略】盖所崇者文，而所以崇文者，文以载道也。今虽中外道通，世局日异，文亦浸衰矣。然时有古今，士诚守千古不变之理法，所以挽时局者，亦未始不在此。

煮不文，承前中丞崧公、今大中丞廖公先后委主崇文讲席，以才疏学浅，辞不获命。今夏授职越中，始谢去。又适当崇文十刻之期，所以翁涛可以直接排除。而翁焘只是举人，所以怀疑进士门头上的匾额题的是“乡进士”，并不是真的进士。因明清时期读书人只要考中了秀才，就可以在当地官府申请各种牌匾。为了好听，流行将举人冠以“乡进士”，把府学、州学、县学每年从年深的廪生中挨次升贡、选拔到北京国子监深造的岁贡生雅称为“岁进士”。而且这个翁焘为钱塘籍。

“翁焘，字又鲁，号亦衡，慈溪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十六年（1890年）进士。官绍兴府教授。”于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上下二册，其中《崇文书院课艺十集》上记载，“光绪甲午（1894年）十月开雕”“掌教翁又鲁先生鉴定，监院许承绶、姚巳元编校”。除翁焘的简介外，还有他写的一段序：

“【略】盖所崇者文，而所以崇文者，文以载道也。今虽中外道通，世局日异，文亦浸衰矣。然时有古今，士诚守千古不变之理法，所以挽时局者，亦未始不在此。”

网上还有翁焘为民国《上虞严氏家乘》所作《序》，其中有句载：“岁甲午日东兵事起，仆适掌教崇文……皇帝龙飞建元之岁仲春二月，兼摄虞山学录，自夏历秋，适越庠修筑，唯两地往还焉。”

还有《枯木禅琴谱》翁焘的诗记：“己丑庚寅寓京，仁和阮端之大令达元精琴律，都中推第一，山东三世琴师王君心源折服焉。”

再是翁焘的题字，绍兴鲁迅纪念馆西北侧朱家台门“老磐庐”，有明代重臣朱熹故物磐石一座，绍兴府教授翁焘曾拜谒此石，并刻有“金廷相公故物，翁焘拜题”等字样。

综合上面这些资料，可知翁焘博学多才，善诗文，通音律，能书法，在文化教育界声望较高。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后并未授职知县，而是被两位浙江巡抚崧公（叶赫崧）和廖公（廖寿丰）先后委任主掌崇文书院。崇文书院为杭州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题榜“崇文”，遂更名为“崇文书院”。光绪年间，海宁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在此读书。此前掌教马传敷为咸丰九年（1859年）会元，二甲第24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主掌蕺山、龙山、崇文书院，先后三十年。叶赫崧任光绪十八年（1892年）八月至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廖寿丰任光绪十九年十二月至光绪二十五年正月，翁焘主掌崇文书院应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八月后，1894年甲午之战时还在掌教崇文书院，1895年夏方任绍兴府学教授，成为绍兴府最高教育长官。知县为正七品，绍兴府教授也是正七品，品级相同。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兼任上虞县学，在绍兴、上虞两地来回奔波，而民国后再无信息。

去周家段查看进士门头，大屋早已改造得面目全非，只能依稀看出原来四合院式的模样。新建的屋边有几块残破的石构件，好像是牌坊或是门头上的。东北角的两间厢楼还在，但房顶已穿，楼板已塌，整个楼房摇摇欲坠。询问了周边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不知进士的名讳，只说那两间破房子的主人在上，是不是后代也不得而知。

再一次仔细翻看《翁氏家乘》，周家段翁氏在明末清初时迁自鹤皋支派，始迁祖翁岳四和翁岳一脉的翁昂。翁岳四之后有翁昂二、翁昂三，翁昂三，翁昂四。翁昂二之后是一片空白，至今未见鹤皋支派的续谱，所以在查找翁焘高祖翁英、高祖翁廷雍、曾祖翁正中、祖父翁济、父亲翁机及齿录记载的叔伯堂兄弟名字时没有一点踪迹。

孙荣兄说鹤皋翁家也有进士门头，那翁焘祖籍应该可以确定是鹤皋翁家无疑了。可周家段的进士门头又是怎么回事？大概是翁焘中进士后，作为同宗的周家段翁氏族人也想建牌坊、挂匾额、立旗杆，以此光耀门庭，这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做法。可周家段翁家未建宗祠，于是牌坊、匾额等都设在了祖堂思本堂，因有进士匾额，后人将思本堂称之为进士门头，误以为此处即是进士翁焘的宅第。

孙荣兄说鹤皋翁家也有进士门头，那翁焘祖籍应该可以确定是鹤皋翁家无疑了。可周家段的进士门头又是怎么回事？大概是翁焘中进士后，作为同宗的周家段翁氏族人也想建牌坊、挂匾额、立旗杆，以此光耀门庭，这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做法。可周家段翁家未建宗祠，于是牌坊、匾额等都设在了祖堂思本堂，因有进士匾额，后人将思本堂称之为进士门头，误以为此处即是进士翁焘的宅第。

孙荣兄说鹤皋翁家也有进士门头，那翁焘祖籍应该可以确定是鹤皋翁家无疑了。可周家段的进士门头又是